

中國傳統民居的類型

• 梅 青

在我近幾年陸陸續續的民居考察中，有一問題時常縈繞於心：民居的外在形式雖因地理條件、自然條件的不同而千差萬別，但為甚麼它們的形態卻是一致的呢？皖南、江浙、中原及北方甚或南方沿海一帶，普遍存在着一種圍合形態的合院式民居，家族成員的座落位置、居住空間和院內的排列秩序亦完全一樣。另外，以家族、宗族為核心的居住形態在中國亦隨處可見。大到一座村落，小到一個住宅，都能看到列祖列宗或祠堂牌位在建築中的核心作用。城市的民居雖然外觀各異，但也存在一些普遍性原則，例如屬於市民階層、工薪階層的住宅，在各個城市中的模式何其相似。這令人想到，人類居住模式並非單純關乎建築本身。倫理價值系統，信仰或文化模式對民居的選址、營建、發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響。

中國建築的演變和類型如同一個類型譜系、指示出文化系統的類型和它近代演變的軌迹。

一 以傳統儒學為基礎的「禮制」型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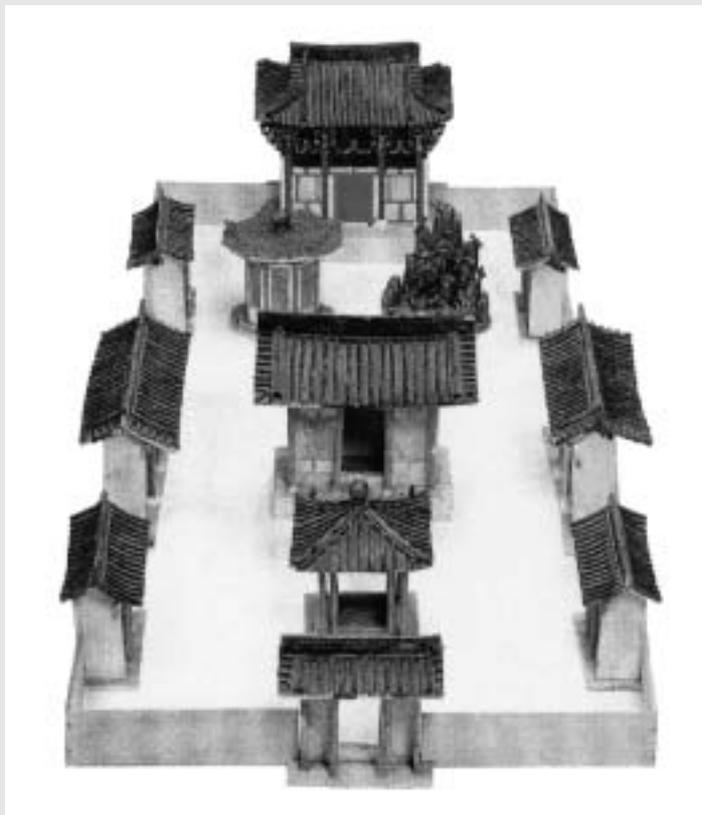
儒家的世界觀，是一種入世的世界觀，因而非常重視現實世界和現實生活。儒家的學說，統治着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為人們制定了行為的準則。特別是倫理道德觀念，對民居的布局與發展，更有着深刻的影響。大到國家，小到家庭，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如擇「中」立國，以中軸線對稱的城市宮殿與住宅的布局，都具有強烈的政治倫理色彩，可以說是「土木寫就的政治倫理學」^①。

在傳統的以體現禮制、尊卑、等級為出發點的典型四合院建築中，清晰地表達了儒家的中庸、平和、規矩、有序的人生哲學。四合院是嚴格依照中國家庭中的人倫關係而布局的，坐北朝南，中軸線上依次是祖輩、父輩、子輩、孫輩……，兩側的廂房及倒座，地位低微，供下人居住。其橫向的擴展，也是根據家族之間的輩份關係而依序發展，不可造

次。一座大型的四合院，實際就是一個家族的血脈關係及族譜關係示意圖。四合院式的民居，除體現了封建禮制的儒學傳統外，也表現了人們求取住宅整體平衡的願望。採取前後左右以中軸線為對稱的住宅平面布局形式，以完善、完美為最高原則，追求四平八穩，渴望安定平和的心理特徵。

不難發現，四合院對外封閉的形態，與宮殿、城市以致國家的對外封閉形態如出一轍。從戰國時代起便陸續修築的旨在保衛國家疆土的萬里長城，最容易解釋中國人對於「國」字的漢意理解。城牆，使一國之中的百姓國民在其中規規矩矩，各司其職。而中國城市的傳統布局，亦是橫平豎直、整齊方正的，「左祖右社，面朝後市」^②。嚴格的等級規範不得逾越，君臣、父子、夫婦、男女的儒家倫常

圖為唐代的四合院模型，當時的住宅普遍採用有明顯中軸線、左右對稱的平面布局，充分表達了儒家嚴格的倫常規範傳統。



關係從中表露無遺。家庭小社會，社會大家庭，家國同構。這就不難解釋，合院式民居為何均以高高的圍牆來封閉自己。無論住宅、宮殿、城市、國家，均深受儒家的倫常規範及宗法等級觀念的制約。

在合院式以及其他民居院落的內部布局上，深宅大院一重又一重的門，清晰表明了內外有別、尊卑有序的原則，而客家土樓的每一單元由下至上一層一層的居住秩序，皖南民居由外及裏的進進天井，所有這些，不正體現了儒家所推行的人間秩序嗎？

二 宗族觀念為主導的「聚族而居」式民居和「圖騰式」民居

在四合院民居中，決定其形態的有兩個因素，一是儒家倫理，另一個是宗族。當影響民居的文化因素中儒家倫理成分減弱時，傳統民居就表現為兩種其他類型。一種是「聚族而居」式民居，另一種是「圖騰式」民居。

一些偏離中原的農村，由於受傳統儒學影響較少，聯繫百姓之間的紐帶則是同祖同宗的血緣關係。在這樣的農村，村落的布局往往以家廟、宗祠為核心，同宗姓的大小住宅則環繞着它而布置。最終，家廟、宗祠所在的場所，成為全村最熱鬧的、舉行各種活動的空間。一村之中，不同祖宗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家廟、宗祠，由此形成若干個公共性中心，相應的出現以此為核心的一簇簇民居組團。組團的中心為宗祠，即祭祀列祖列宗的祠堂，也是族長召集族人商議族內事務

的場所，宗祠的周圍作環形放射狀的散置着許許多多的住宅，具有明顯的向心作用。也許，這種形式可上溯到遠古的居住形態——那種環繞「公共大房子」而自發形成的居住布局雛形。我們除了可以在村鎮民居群落的布局關係上看出這種以血緣關係、宗族關係為主的聚族而居的傾向外，也可以從一座座的住宅清晰地看出這種觀念。客家土樓就是最好的說明。

客家土樓的存在，是由於百姓為躲避戰亂而南遷到閩、粵、贛三省交界地帶居住。這裏群山連綿環繞，似乎隔絕了北方的敵人。至於客家人為何採取這種居住形態，眾說紛紜。土樓先有方還是先有圓；是模自閩南的形式還是中原帶來的……，這些一直都是研究的熱點。拋開土樓形式本身的問題，也許「聚族而居」的宗族觀念是考察上述問題的關鍵。為了家族的安全、宗族的延續，為了防止外族的侵略及山賊的騷擾，於是便產生了這種土樓式的民居。如承啟樓所表明的，土樓的完整形態是以祠堂為內核，一環一環外推，形成五個環的、對外封閉的造型。一座土樓，居住着一個家族的成員；較大的土樓，甚至就是一個完整的宗族聚落。這種聚族而居的居住形態，常出現在偏僻的山區及人迹罕至的遙遠山寨。這往往是家族自我保護、自我延續和完善的一種願望的體現。異域他鄉，每個家族要頑強地生存下來，就必須團結一致以抗禦可能來自外族的侵略。每一個家族都深切體會到他們內部的關係是同生死共命運的，因而也更增強了家族的凝聚力，「聚族而居」的規模亦隨之不斷擴大。建立在血緣宗族觀念之

上的居住模式，至今依然十分常見。在偏遠的少數民族居住區，一族之長仍有着無尚的尊嚴和不可動搖的威力；同時，祠堂及族長之所在，也是全族居住的核心。

在邊遠農村及少數民族地區，儒家文化影響力進一步減弱，其他民間信仰和習俗對民居形態也就顯示出來了。一些較落後原始的地方，如雲南的某些民族、某些村莊有自己本民族的圖騰信仰。有的以牛或某種動物作為「圖騰」，有的則以植物作為「圖騰」崇拜，例如很多村寨都以榕樹作為「圖騰」，又如很多的民居之中皆懸掛着葫蘆。

在這些民居、村落環境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當地居民悉心地保護着、供奉着這些被視為圖騰的動植物；而有的地方則建構起象徵性的石龕、祭壇等。村民常在這些地方舉行盛大的慶典和祭祀活動。漸漸地，在這些被當作圖騰崇拜的自然物周圍衍生出越來越多的人工構築，如小廣場、戲臺、井臺等，使得這一空間成為村民住宅的核心並被視為聖地。古老的村寨，往往有很多類似的核心，每個核心有着各自的崇拜物。而整個村莊，就是由這些不同圖騰崇拜所帶來的聚落形式所串聯起來。這種大家默認的、約定俗成的自然物圖騰信仰，具有很強的凝聚力。

三 文人雅士的「園林化」民居

學術界在談論中國文化大傳統時，常用「儒道互補」這樣的概念來界

定它。文化上的「儒道互補」在民居形態上也有表現，這就是文人雅士的「園林化」民居。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③這本是晉代詩人陶淵明的詩作，它也是文人雅士對住居環境所共有的追求和心靈的寫照。

文人雅士選擇的居住形態，大多為園林化的民居。居住部分依然按傳統住宅的禮制樣式，布局得規整而拘謹。此外，附加了一部分園林山水，將刻板的住居環境變得勃勃富有生機。文人雅士之所以選取園林化的居住形態，一方面是由於他們是官僚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完全違背傳統的禮制，住宅也依然嚴格遵照傳統禮制布局；另一方面，他們又具有道家文化及居士的心態，渴望自由，渴望田園風光，因此營建了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的居住環境，以抒發胸中的書生意氣。「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④文人雅士雖然有着儒家的入世思想，然而更多是懷着老莊的出世情懷。這種入世與出世的雙重思想，清晰地體現在他們對生活方式與住居環境的選擇上。這種理想主義的浪漫，亦反映在他們的詩畫之中，有着鮮明的、個性化的宣泄。

園林化的民居，在平面布局上突破了僵化呆板的構圖，模仿田園風光

的小橋、流水、人家。平面構圖隨意、自然，卻不失疏密與章法，創造出建築之中流動自然、自然之中包融建築的基本格調。園林的立意，源於自然、高於自然，在意境的創造與表達上，往往意會超過形傳。不難看出，「園林化」居住形式背後所深藏的，是文人雅士理想主義的積極進取與清高孤傲的消極避世的矛盾世界觀。

四 市民階層的「城市型」民居和「中西合璧」式民居

近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開始從傳統到現代之轉型，這一過程在民居形態上也表現得很明顯。隨着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的「城市化」進程，城市人口、工薪階層猛增，建築速度加快，地價急漲，城市民居逐漸商品化。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土地，便成了不能迴避的問題。上海的里弄（弄堂）為「城市型」民居提供了一種模式。這些「弄堂」是租界時代產生的、具有獨特風格的集合住宅街。沿着縱橫交錯的小弄，密集地群立着幾十個連在一起的長條形房屋，或只有幾戶為單位的住宅房屋或公寓，錯落成群，顯示出在狹小土地上容納大量居住者的智慧。其中最簡樸的是面闊只有三米左右而縱深狹長、呈長條形的房屋，一進門就是臥室，臥室後面是一間小廚房和後門。在這樣的長條形房間的同一個屋脊下連着幾戶甚至幾十戶，而且不管哪家必有後門，並隔着小弄堂，對着後一排長條形房子的

前門。比這種老式里弄稍為好些的長條形住房——石庫門式住宅，依然是長條房，有着堂堂的大門。磚牆，大理石鑲邊的雙開大門，其中滿壁刻着浮雕，進門就是一個小小的天井式庭院，經過庭院就是房間，之後布局與老式里弄的住房布局一致。這種石庫門式住宅，深受江南庭院式傳統住宅的布局影響，同時，又適應城市市民階層的需求及寸土寸金的經濟效益。其獨特的小巷網絡的排列，成為城市的住宅模式，並一直延續至今。隨着城市中工人和職員的激增，使得這種石庫門式住宅的房間和樓層數目不斷增加，庭院面積不斷減少，底層有更多的店鋪。同樣，北方的城市，諸如天津、瀋陽等地，「城市型」民居也相當普及。這種聯排式住宅的特色，既注重基本的生活功能，亦強調了市民階層所處的城市的經濟性、效益性和功利性。

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人士中，存在着一個特殊階層。這個階層的產生及發展，始於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新興的買辦、民族資產階級、華僑實業家，手操不大不小的權力，身兼中西兩個社會的職位，有着中西文化的雙重熏陶和背景。他們所興建的住宅——無論是城市中的公館，抑或是鄉野外的別墅，都有着與眾不同的地方。為了顯示他們的特殊地位和巨大財富，他們選擇的地點多屬城市中較為幽靜、舒適方便的地段。建造公館以常住為主，亦在郊外風景絕佳處，建造渡假別墅。在外觀上，這些住宅或採西方風格，或是中西混合，而內部的裝飾亦有不同的風格。對這一階層的人士來說，「住宅便成為一

個適當的符號來象徵他們同處中西兩個社會的特殊地位和文化品味」^⑤。在我國相當多的早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或地區中，都存在着此種類型的住宅。隨着這一階層的不斷發展、壯大，這類住宅的量和質也在不斷變化，規模漸大，形成了特殊的區域。這些區域的總體文化氛圍，有西方格調的，有中式傳統的，而更多是折衷的。如廈門的鼓浪嶼區，幾乎80%的住宅都具有中西折衷的建築風格^⑥，這反映了這一階層人士的特殊生活經歷和文化取向。

註釋

① 參見王振復：《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建築美》（上海：學林出版社，1989）。

② 見《考工記》中「……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③ 陶淵明五首「歸園田」詩之一。

④ 〈竹里館〉，《王維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⑤ 參見何培斌：〈兩個城市之間——香港華人精英的建築品味〉，《建築師》（台灣），1994年5月。

⑥ 根據1987年—1994年間進行的實地調查與測繪所得數據。

梅 青 南京東南大學建築學碩士，現任廈門大學建築系講師。